

励志·人生(下)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丛书名：现代文学

书 名：励志·人生(下)

作 者：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ISBN：7-88050-475-3/127

定 价：10.00

下篇

谈灵心

你也许说人类的灵心是造物主最高贵的产物。这话大多数人是以为如此的，尤其是指像爱因斯坦的那种灵心一般，能以一个长的数学方程式，去证明弯曲的空间。或像安迪生的灵心那样，发明留声机和活动影戏，或像其他物理学家的灵心那样，能测量出一颗行近地球，或远离地球的星辰的光线，或去研究无从捉摇的原子构造，或是像彩色电形摄影机发明家的灵心一样；和猴子的无目的的，善变的，暗中探索的，好奇心比较之下，不得不使我们承认，我们确有一个高贵的，伟大的灵心，有一个能够了解这宇宙的灵心。

然而普通的灵心只是可爱而不是高贵的。如果人类的灵心都是高贵的，那么我们将变成完全合理的动物，没有罪恶，没有弱点，也没有错误的行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世界将变成一个多么乏味的世界！我们一定会变成极讨厌的动物。我是一个人性主义者，所以一无罪恶的圣人，引不起我的兴趣，而在我们的不合理中，自相矛盾中，愚笨中，戏耍假日的欢乐中，成见中，顽固中，和健忘中，我觉得我们都是可爱的，如果我们都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头脑，则我们在每一新年里，便无用作新的计划，当我们在除夕，回想到新年里，所决定的计划时，我们发现只做到了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不曾实现，还有三分之一则已经忘却了。人生之美便在这里。一个计划如果可以完全实现，便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一个将军如果预先知道，可以绝对独胜，连双方死伤的确数也能预料得到，他对战事便会失掉兴趣，还不如把它放弃不干爽快些；下棋的人，如果知道对方的灵心——不管是比他好的，坏的，或平常的——，而无错误，便不会再想下棋。如果我们看小说时，确知书中每个人物的未来灵心动作，因此而料到小说的最后结果，那么所有的小说，便无一读之价值了。阅读一部小说，但是在追求一个多变的不可测度的灵心，这个灵心，由一条以许多连续发生的情势，而造成的迷路，在相当的时候，实现其不可测摸的决定。如在小说中写一个严峻的，无宽恕心的父亲，假如一直没有宽容子女的时候，在我们看来，便不再像是一个人，甚至是一个不忠实的丈夫。如果永远是这样的话，不久就会失掉读者的兴趣。你可以假想一位骄傲的作曲家，人家无论怎样规劝他，总不愿替某一位美丽的女人，写一首歌剧。可是当他一听见有一位他所憎恶的作曲家，想做这件工作时，便会马上答应的。或试想一位科学家，发誓不把他的著作刊在报纸上，可是一看见一位和他竞争的科学家弄错了一个字，他便会忘掉自己所定的规律，拿着作品去发表，这里，我们把握到人类灵心的特性了。

人类的灵心，是不合理的，是固执的，偏见的，是任性的，是不可预料的，因此也就可爱。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个真理，那么我费去一百年，在人类心理学上的研究工作，便不能算为有结果。换言之，我们的灵心，仍保存着人猿智力上那种无目的，人暗中摸索的性质。

请试看人类灵心的演进程序。我们灵心的功用原本是一个觉察危险而保全生命的器官。而它的终于能够体会逻辑和准确的数学方程式，仅是一桩偶然的事。我们的这个灵心确不是为这种功用而创造的。它的原来功用是仅想嗅嗅食物，但除了嗅嗅食物外，如也能嗅嗅一个抽象的数学公式，那是固然也不坏。以我的观念，人类的头脑是像一条章鱼或海盘车，长了一些触角以

便摸索真理，待摸到后就把他吃掉，（我对其他动物的头脑观念也是如此）我们今日总说“摸索”真理（Feeling）而不说“思索”真理（Think）脑部及其他的感官就是摸索用具。头脑的触角，怎样摸索真理，在物理学上，有着一个很奥妙的现象，正如眼睛网膜中的紫色怎样感光一样奥妙。当头脑每次和其他有关的知觉器官，脱离联系从事所谓“抽象的思维”时，当每次离间杰姆斯（W. James）所谓知觉的现实（Perceptual reality）而逃进意念的现实世界（The world or conceptual reality）时，它的活力消灭了，人性也消失了，也退化了。我们都被一种错误的见解所困惑，以为灵心的真实功用，便是思维，如果我们不更正我们对“思维”这个名词的错误观念，我们一定会在哲学上造下很笨拙的错误。当一个哲学家走出他们的书房，去观察市场上的往来群众时，这个错误的见解，一定会使他感到幻灭，好像思维与我们日常的行为，是很有关系似的。

已故的罗宾孙（Jameasharvey Robinson）在创造中的灵心（The mind in the making）里，曾经想证明我们的灵心是怎样由于四个基本阶段而产生，他以为人类的灵心，是由于动物的灵心，野蛮人的灵心，孩童的灵心，和传经的文明的灵心，渐渐产生出来，现在还在这四个基本阶段上进展着；他同时又更进一步说，如果现代的人类要把文明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我们还须产生一个更善于批评的灵心。我的思虑比较科学化的时候，颇赞同这个见解，可是在比较明慧的时候，却怀疑这个阶段在一段的进步上，是否能办得到，或甚至是否适宜。我颇愿让我们的灵心，像现在一样地不合理下去，这是可爱的。我不愿见到我们在这世界上都变成十全十美合理的人类，我不相信科学的进步吗？不，我不信任圣者的境界，我反对知识吗？或许是或许不是，我只是爱好人生，因爱好人生，所以我极端不信任智能。你可以幻想出一个完美的世界，在那里报纸上没有杀人的新闻，因为那时大家都是无所不通，无所不知，因此没有一所房屋会发生火警，没有一架飞机会失事，没有一个丈夫会遭遗弃他的老婆，没有一个牧师会跟歌女私奔，没有一个皇帝会因恋爱而牺牲皇位，每个人的心思都千篇一律，大家都各照着他自己在十岁所决定的计划去实行，丝毫不苟——这么一个幸福的人世还是省了吧！在这么一个世界里人生的一切兴奋和骚动全部消灭了。世界没有文学了，因为那时已没有罪恶，没有错误的行为，没有人类的弱点，没有混乱的情欲，没有偏见，没有不规则的举动，最坏的是，没有令人惊异的事物。那就等于四五万观众在看他们预先已知道那一只马得锦标的跑马比赛一样，而毫无趣味。人类易生错误的本性，是人生色彩的精粹所在，正如跑马比赛上的出冷门一样的有兴趣。试想强生博士（Dr. Johnson）如果没有他的固执偏见将成为怎样一个人？如果我们全是十全十美合理性的人类，那么我们非但不能变成十全十美的智者，反而将退化而成自动机器，而人类灵心也只在记录某一些行动，像煤气表那样机械地记录下来。这便是人不道的行为，而不人道便是不好。

读者或许疑心我在故视罪恶为美德，竭力替人类的弱点辩护。这是不对的。如果我们一方面有了一个完全合理的灵心，而独得了合理完美的行为，另一方面，却会失去了人生的欢乐和色彩。跟一个具着美德但是平凡的模样的人或妻子同过一生，是再无聊也没有的事，我相信这种种极其合理的人类所造成的社会，确是适于生存的，但我疑惑在这种情境之下的生存是否值得。我们固然要想尽种种方法去造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可是我们却不要

太过于有秩序的社会。我想世界上，也许蚂蚁这种动物，是最合理的动物。它们无疑地已经创立了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种制度之下生活了近一百万年。如单以合理的行为方面而论，我想蚂蚁应当占第一位，人类占第二位。（但我还是怀疑我们是否有这个资格）蚂蚁是一种耐劳的，健全的，好储蓄的，肯节俭的动物。它们的生活都受着社会的统制和自我的训练，但是我们却不然。它们为了国家或社会，肯一天工作 14 小时；它们只知道义务而很少想到权利；它们有恒心，有秩序，有礼貌，有毅力，尤其有着严明的纪律。人类在纪律方面是拙劣的标本，拙劣到连做博物院里的样本也够不上。

你可以跑到名人纪念堂去看看那些陈列在甬道上的伟大人物的雕像，你便能觉得他们的一生中合理行为是最缺少的东西。那个爱上克丽奥巴德（Cleopatra）的凯撒（Julius Caesar）——高贵的凯撒，他为行为太不合理了，几乎为了一个女人而忘掉了帝国。（安东尼（Anthony）却是完全忘掉帝国的。）那个摩西——在一怒之下，把他那花了四十天工夫跟上帝在西乃山上铭刻的神圣石板敲碎，以这一点而论，他并不比那些叛弃上帝去崇拜金犊的以色列人更有理性。那个大卫王（King David）——有时残暴，有时慷慨，有时虔诚，有时褻渎，有时敬拜上帝，有时犯罪，后来写了诗篇来表示忏悔，重新敬拜上帝。所罗门王。（King Solomon）——他是智慧的象征但对他的儿子却一筹莫展——孔子——他回答一个宾客说，他不在家，等那客人刚走在门口时，他又在楼上唱歌，使客人知道他确是在家。……耶稣在——喀西马尼流泪，在十字架上怀着疑心。……莎士比亚——把“次好的床”遗赠给老觉……米尔顿（Milton）——因为不能和他十七岁的妻子共同生活，写了一篇离婚的论文，后因受人攻击，便在自由请愿书（Areopagitica）一文里替言论自由辩护——歌德（Goethe）和他的夫人在礼拜堂举行结婚礼时，他们那十九岁的儿子就站在旁边看。史威夫脱（Jonathan Swift）和史黛拉（Siel-la）……易卜生（Ibsen）和巴达法（Emilie Bardach）（他保持着合理的行为——这对他是有益的。）……

统治这世界的是热情，不是理智，这已是很明显了。所以这些伟大人物，都成为可爱者，使他们有人性者，实是他们缺乏“理性”，而不是“合理性”中国人为他们祖先所写的讣闻和传记，大都是无趣味的，不正确的，所以不堪一读，因为他们已把他们祖先写成变态的，完全伪善人。——他们对于我所著的吾士吾民最大的批评是：我把中国人描写得太有人性了，因为我把他们的长处和缺点都描写出来。他们（至少那些小官僚们）相信如果我如把中国写成一个乐园，只有儒家圣贤居住，永远过着和平和理智的幸福生活，我就能够替祖国做更有力的宣传！官僚们的愚蠢真是没有办法。——传记之有魔力，和传记之值得一读，全在其表现伟大人物所具和我们相同的人性方面的特性，传记里每一个不合理的行为，都能显示其更真实性。德拉齐（Lyttou, Strachey）作品之所以成功，但是他在描画人物时能注意这一点。

英国人的健全灵心，可以作极佳的例证，英国人对于逻辑，尚欠高明，但是他们的头脑，却有着很好触角，去察觉危险保全生命。不过我在他们的民族行为上，或他们的理性的历史里，还寻不出合于逻辑的东西。他们的大学，宪法，英格兰教会，都是杂凑成章的东西，因为它们都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累积起来的。不列颠帝国的力量就是在于英国人的脑筋欠高明，在他们完全不能了解别人的意见，他们深信英国人的工作方法，是唯一正当

的方法，英国人的食品，是唯一精老的食品。英国人如一旦懂得了讲道理，并失去了倨张的自信心时，不列颠帝国便会倾覆灭亡。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尚且怀疑，便不能出去征服世界。我们全然不能了解英国人对他们国王的态度，一方面如此忠诚，和真实敬爱；但也就是他们剥夺了国王的言论自由，毫无顾忌地告诉他行为要谨慎，否则“滚你的蛋”……英国在伊利莎白女皇时代，需要海盗来保护帝国，他便居然能够有着相当数目的海盗，以应付当时的局势，因而也就崇敬他们。英国在每一时代，都能在适当的时候，有着适当的同盟国，对付着相当的仇敌，从事适当的战事，可是她总用着一个不适当的名称。英国人从不依逻辑去行事，而是靠着他们的触角去行事的。

英国人有着红润的肤色，无疑地这是由于伦敦的雾和玩扳球戏的结果。这么一个健康的皮肤在他们思想上，当然占着极重要的地位，换句话说在他们摸索中，过着一生的程序上占着重要的地位。英国人之用他们健康的皮肤去思想，正如中国人用他们的伟大的肚肠去思想一样。这一回事，凡是中国人大都是承认的，我们中国人以为我们确是用肚肠去思想的；我们说一个学者有学问，便称他为“满腹思想”，“满腹经纶”，“满腹诗文”。此外还有“满腹”的“牢骚”，“愤怒”，“悔恨”，“郁闷”，或“期望”等话。中国的情人分别之后，写信时总说“愁肠百结”，或在别离的当儿说“肝肠痛断”。中国学者，把一篇文章或演词的大意想好，而还没写上纸时，我们便说他们已打好了“腹稿”。他们已经把人们要写的东西，在肚里安排好了。这一点是绝对科学化了的，可以拿得出证据来，尤其是在现代心理学家对于我们思想的情感性质，和构造更为明了的今日。可是中国人并不要科学上的证据。他们只要肚里有数。中国曲调的情感性质，全由唱曲者的横阴膜下发现来；如果你不懂得这个，你就无法了解中国音乐，及其浓厚的情感色彩。

我们在研究自然的宇宙，或和人类无关的任何东西时，极不应该否认人类灵心的伟大才能。我对于科学的成就是很乐观，可是对于善批评的灵心，在应付人类事件时，或对于人类达到一种超过情欲支配的宁静，和理解的境地时的发展，却怀着较小的希望。以我个人的意思，人类也许已经达到崇高的阶级，但是从社会集团这方面说来，人类还是受着原始时代的情欲所支配。因之，在进化的过程上，有时不免要开倒车，野蛮的本能，有时要暴露出来，疯狂的行为，和集团的歇斯的里亚，有时也要产生出来。

我们既然了解我们人类的弱点，所以最有理由可以诅咒那许许多多的坏蛋：即利用我们的弱点，来煽动我们参加二次大战的坏蛋；那个灌输仇恨心理（我们之间的仇恨已经太多了）的人；那个称颂自夸和自私（这二种东西本已不少了）的人；那个利用我们人类的顽固，和种族观念的人；那个在训练青年时，取消了上帝第五诫的人；那个推崇残杀和战争（好像我们还不够好战似的）的人；和那个煽动我们人类的情欲（好像我们还不够像禽兽似的）的人。这种坏蛋的灵心，无论是怎样的机巧，怎样的聪明，终于是禽兽的灵心。智慧的优美精神被一只禽兽，或一个魔鬼纠缠着，这种情形我们现在方知道，也是我们的动物遗传性之一；或也可说：“智慧的优雅精神，拿着一块破旧的皮带，智慧把这个魔鬼缚住，使之驯服，不过这条皮带，随时有扭断的可能，魔鬼也随时可以独得自由，在“和散那”（Hosanna）——希伯来颂赞上帝之声或祇福之语的颂赞声中，偏净天（Jngger-naut）——印度神话中昆湿奴神 Vishnu 第八化身克哩斯那 Krish-na 的称号，每年的纪念日，人民以巨车载其偶像游行各处，如信徒有自伏地下，被车辗死得往天国的车子

将毫无顾忌地在我们身上辗过去，暗示着我们是始终如何的近于野蛮，和我们的文明是多么肤浅。于是世界将变成一个伟大的舞台，在舞台上，摩尔人（Moors）将杀死基督徒，基督徒将弄杀摩尔人，黑种人将攻击白种人，白种人将杀死黑种人，野兽将由沟渠里跑出来吃人类的尸身，鹰鸟将盘旋于一个丰盛的人肉宴席上——这一切不过是要提醒我们使我们知道动物间的关系罢了。大自然是善于做这种实验的。

精神分析学家在医治有精神病的病人时，常常使他们回忆过去的事情，使他们用客观的眼光去观察他们自己的生活。所以人类如果对于他们过去多多回忆一下，这对于他们自己的驾驭力也许会有更大的进步。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有一个动物的遗传性以及跟禽兽相差无几，我们或许就会晓得怎样去抑止那些禽兽般的行为。我们有了这个动物遗传性（使我们更容易在动物寓言和讥讽文章里，如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乔塞的禽鸟国会（Parliament of Fowles）史威夫脱的格里弗游记（Swift's Gull-livra's Travels）和佛郎士的企鹅岛（Anatole France's "penguin Island"）等里边看见我们的原形。这些动物寓言，在伊索时代，固很合时宜，就是救主降生后 4000 年，仍旧是很适合的，我们有补救的方法吗？那善于批评的灵心，是太浅陋，太冷酷，要用这个灵心来思考，是不能得益处的智理的也没多大用处；只有那种合理的，有理性的精神，那种温暖的，朝气的，情感的，直觉的思想，跟着同情混合起来，才不至使我们重复退化到我们祖先的典型。只有去把我们的生命发展起来，和我们的本能调和着，我们才会得救。我们为培植我们的感觉，和情感，比之教育我们的思想，是更为重要的。

谈梦想

有人说，知足是神圣的；我却以为知足是人性的。猴子是第一号的阴沉动物，在动物中，我只看见黑猩猩有一个真正忧郁的面孔。我往往觉得这种动物很像哲学家，因为唯有哲学家，才会有忧郁和沉思的表情。牛似乎不会思想，至少似乎不在推究哲理，因为它们看起来是那么知足：象也许会怀着盛怒，可是它们那不断摆动象鼻的动作似乎代替了思想，而把胸怀中的一切不满都排除。唯有猴子能够显示出彻底讨厌生命的表情。猴子是真够伟大啊！

九九归原的说起来，哲学或许是由讨厌的感觉而开始。无论怎样，人类的物征，便是怀着一种追求理想的，期望一种忧郁，模糊的沉思的期望。人类住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还有梦想另一个世界的能力和倾向。人类和猴子的差异点，也许是猴子仅仅觉得讨厌无聊，而人类除讨厌无聊外，还有着想象力。我们都有一种脱离旧辙的欲望，我们都希望变成另一种人物，大家都有着梦想。兵卒梦想做伍长，伍长梦想做上尉，上尉梦想做少校或上校。一个气魄宽宏的上校，是不把上校当做一回事的，用文雅的词语说起来，他仅仅称之为服务人群的一个机会而已。在事实上讲起来，这种工作方法有什么别的意义。老实说，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对于自己并不像世人那么的注意，珍妮盖诺（Janet Gaynor）对于自己也不像世人那么的注意。世人对一切伟人说，“你们不都是很伟大吗？”如果那些伟人真正是伟大的，他们总会回答道“伟大又算什么呢？”所以这个世界很像一家照菜单另点的餐馆，每一个顾客，总以为邻桌顾客所点的菜肴，比他自己所点的更有味，更好吃。一位现代中国大学教授说过一句谗语，说“老婆别人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在这种意义上说来，世间没有一个人，会感到绝对的满足的。大家都想做另一个人，只见这另一个人，不是他现在的自己。

这种特性无疑地是由于我们有想象力和梦想才能。一个人的想象力越大，就越不能得到满足。所以一个富于想象力的小孩，往往比较难于教育；他常常像猴子那样阴沉忧郁，而不像牛那样地感到快乐知足。同样离婚的案卷在理想主义上和富有想象力的人们当中，一定比无想象力的人们多。一个理想中的终身伴侣的幻想会生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若在缺乏想象和理想的人们便永远不会感觉。笼统地说来，人类有时也被这种理想的力量引入歧途，有时则辅导上进；可是人类终是完全靠这种想象力而进步的。

我们晓得凡是人类都有志向和抱负。有这种东西是可贵的，因为志向和抱负大都被视为高尚的东西。无论个人和国家，都有梦想，我们的行动多少都依照梦想而行事。有些人比一般普通人多做了一些梦，正如每个家庭里都有一个梦想较多的孩子，或是有一个梦想较少的孩子。我得承认我私底下比较喜欢那个有梦想的孩子。虽则是个比较忧郁的孩子；也没有关系；他有时也会享受到更大的欢乐兴奋，和狂喜。我觉得人类的构造和无线电收音机很相像，所差者我们收来的不是播来的音乐，而是我们自己所产的观念和思想。有些灵敏的收音机能够收到其他收音机所收不到的短波，因为这些更远更细的音乐不大容易收到，所以更觉宝贵。

而且我们幼时的那些梦想并不是没有实现性的。这些梦想常和我们终身共存着。因此，如果我自己可以选做世界上作家之一的話，我颇愿做个安特生。能够写女人鱼（The Mermaid）的故事，想着那女人鱼的思想，渴望着到

了长大的时候到水面上来，那真是人类所能感到的最深沉最美妙的快乐了。

所以，无论一个孩子是在屋顶的小阁上，或在谷仓里，或是躺在水边，随处都有他的梦想，而这些梦想也是真实的。安迪生史蒂芬司谷德（SirWalterscott）这三个人在幼年时都梦想过。这种奇妙的梦想，结出了最优美最瑰丽的果。但是较平庸的孩子也会多少有过这些梦想。他们梦想中的幻象或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感觉到的快乐是一样的。每个小孩子，都有一颗思慕的心切望的灵魂，怀着一种热望去睡觉，希望在早晨醒过来时发现他的梦想已成为事实。他并不把这些梦想告诉人家，因为这些是他自己的，是他正在生长的自我的一部份。小孩子的梦想当中，有些较为清晰，有些较模糊，清晰者产生了迫切这梦想实现的力量；而那些较不明晰的便在长成的时候逐渐消失。我们一生中，总想把我们幼时的梦想说出来，但是“有时还没有找到我们所要说的话，我们已经死了。”

讲到国家也是这样，她也有其梦想，这种梦想可以经过许多的年代和世纪，依然存在着。有些梦想是高尚的，有些却是歹恶的。征服人家，和那些独霸世界一类的梦想，都可说是恶梦；这种国家比之那些较有和平梦想的国家不安得多。不过另外也还有较好的梦想，梦想着一个更好的世界，梦想着和平，梦想着各国和睦共处，梦想着减少残酷减少不公平，减少贫穷和痛苦。恶梦常想破坏好梦，因之二者之间不断地搏郁苦战。人们为梦想而斗争，正如为财产而斗争一样。于是梦想即由幻象的世界，走进了现实的世界，而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真实力量。梦想无论怎样模糊，总潜伏在我们心底，使我们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成为事实才止；像种子在地下一样，一定要萌芽滋长，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所以梦想是真实的。我们有时也会有混乱的梦想和不符合现实的梦想，那是很危险的。因为梦想也是逃避的方法之一：一个做梦者常常梦想要逃避这个世界，但是又不知道要逃避到哪里去。知更鸟常常引动浪漫主义者的幻想。人类有一种热烈的欲望，想把今日的我们变成另一种人，脱离现在的常轨；只要是促成变迁的事物，一般人便趋之若鹜。战争总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使城市里的事务员有机会可以穿起军服，扎起绑腿布，可以有机会免费旅行；同时在战壕里已经渡过三四年生活的兵士，而觉得厌倦了的时候，休战也是情愿的，因为这又使他们有机会回家再穿起平民的衣服，打上一根红领带子。人类显然需要这种刺激；假如世界真要避免战争的话，最好各国政府行一种制度，每隔十年募集二十岁至四十五岁的人，送他们到欧洲大陆去作一次旅行，去参观博览会一类的盛会。现在英国政府正在动用五十万英镑去重整军备，我想这笔款子尽够送每个英国人民到利维埃拉（Riviera 法国东南地中海边名胜区）去旅行一次了。他们以为战争的费用是必需的，而旅行是奢侈。我觉得不很同意！旅行是必需的，而战争才是奢侈哩。

此外还有其他的梦想，如乌托邦的梦想和想长生不老的梦想，虽则也像其他的梦想一样地模糊，但是十分近于人情，而是极其普遍。不过人类如果真的可以长生不死，到了那时恐怕他们也要不知所为。长生不死的欲望，跟站在另一极端的自杀心理属于同类。二者都厌恶这世界。以为现在的世界还不够好。如果问为什么现在的世界还不够好呢？我们只要到春天到乡间去游览一次，就能知道这句问话是不应该问而觉得惊异了。

乌托邦的梦想情形也是如此。理想仅是一种信仰另一世态的心境，不管它是什么一种世态，总之只要和现代人类的世态不同就是了。理想的自由主

义者，往往相信本国是国家中最坏的国家。他所生活的社会是最坏不过的社会。他依然是那个在餐馆里照单点菜的家伙，相信邻桌所点的菜总比他自己所点的好吃。纽约时报“论坛”的作者说：在那些自由主义者的心目中，只有俄国的聂泊水闸是一个真正的水闸，而民主国家永没有建筑过水闸，当然也只有苏联才造过地底车道。在另一方面，法西斯报纸告诉他们人民说，只有在他们的国度里，人类才找到世界上唯一合理的，正确的，可行的政体。乌托邦的自由主义者和法西斯的宣传主任，他们的危险便在这里。为纠正起见，他们必须有一种幽默感。

谈德性

德性“Character”是一个纯粹英国典型的字，除了英国以外在他们的教育和人格的理想上把“德性”看得像中国那样着重之国家恐怕是很少很少。中国人的整个心灵好像被它所控占着，致使他们的全部哲学，直无暇以计及其他。全然避免离世绝俗的思想，不卷入宗教的夸耀的宣传，这种建树德性的中心理想，经由文学、戏剧、谚语势力的传道，穿透到最下层的农夫，使他有一种可凭借以资遵奉的人生哲理。不过英语Character一字，尚表现有力量、勇气、癖性的意义，有时更指当愤怒失望之际所表现的抑郁；而中国文中的“德性”一语，使吾人浮现出一性情温和而圆熟的人物的印象，他处于任何环境，能保持一颗镇定的心，清楚地了解自己，亦清楚地了解别人。

宋代理学家深信“心”具有控制感情的优越势力。并自负地断言，人若能发明自己的本心并洞悉人生，则常能克胜不利之环境。大学为孔教的入门书籍。中国学童初入学，常自读此书始，他把“大学之道”学义为“在明明德”，这样的意义，殆不可用英语来解释，只可以说是智识的培育发展而达于智慧的领悟。人生和人类天性的圆熟的领悟，常为中国德性的理想；而从这个领悟，又抽绎出其他美质，如和平、知足、镇静、忍耐这四种美质即所以显明中国人德性之特征。德性的力量实际即为心的力量，孔门学作者如是说：当一个人经过智育的训练而养成上述的德行，则我们说：他的“德性”已经发育了。

往往此等德行的修养，得力于孔教的宿命论。宿命论乃和平与知足之源泉，适反乎一般所能置信者。一位美丽而有才干的姑娘，或欲反对不适合之婚姻，但倘值一个偶然的环境使她与未婚夫婿不期而遇，则可使她信以为这是天意欲牵合此一对配偶，她马上可以领悟她的命运而成为乐观知足之妻子。因为她的心目中，丈夫是命中注定的冤家，而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前世冤家，狭路相逢”。有了这样的理解，他们会相亲相爱，又时时会吵吵闹闹，扭做一团，打个不休，所谓欢喜冤家。因为他们相信顶上三尺有神明，而这神明却监临下界，有意使他们免不掉此等吵吵闹闹玩把嬉。

我们倘把中华民族加以检讨，而描绘出他们的民族德性，则可以举出下列种种特征：（一）为稳健，（二）为淳朴，（三）为爱好自然，（四）为忍耐，（五）为无可无不可，（六）为老猾俏皮，（七）为生殖力高，（八）为勤勉，（九）为俭约，（十）为爱好家庭生活，（十一）为和平，（十二）为知足，（十三）为幽默，（十四）为保守，（十五）为好色。大体上，此等品性为任何民族都可能有的单纯而重要的品性。而上述所谓德性中之几项，实际乃为一种恶行，而非美德，另几项则为中性品质，它们是中华民族之弱点，同时亦为生存之力量。心智上稳健过当，常削弱理想之力而减损幸福的发扬；和平可以转化为懦怯的恶行；忍耐也可以变成容纳罪恶的病态之宽容；保守主义有时可成为迟钝怠惰之别号，而多产对于民族为美德，对于个人则为缺点。

但上述一切性质都可以统括起来包容于“圆熟”一个名词里头。而此等品性是消极的品性，他们显露出一种静止而消极的力量，而不是年青的活跃与浪漫的力量。它们所显露的文化品性好像是含有以支持力和容忍力为基础之特质，而没有进取和争胜精神的特质。因为这种文化，使每个人能在任何环境下觅取和平，当一个人富有妥协精神而自足于和平状态，他不会明了年

青人的热情于进取与革新具有何等意义。一个老大民族的古老文化，才知道人生的真价值，而不复虚劳以争取不可达到之目的。中国人把心的地位看得太高，致剥削了自己的希望与进取欲。他们无形中又有一条普遍的定律：幸福是不可以强求的，因是放弃了这个企望。中国常用语中有云：“退一步想”、故从没有盲进的态度。

所谓圆熟，是一种特殊环境的产物。实际任何民族特性都有一有机的共通性，其性质可视其周围的社会、政治状况而不同，盖此共通性即为各个民族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园地所培育而发荣者也。故“圆熟”之不期而然出产于中国之环境，一如各种不同品种的梨出产于其特殊适宜的土地。也有生长美国的中国人，长大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就完全不具普通中国人之特性；他们的单纯的古怪鼻音，他们的粗率而有力的言语，可以冲散一个教职员会议。他们缺乏东方人所特具之优点：柔和的圆熟性。中国的大学生比之同年龄的美国青年来得成熟苍老，因为初进美国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青年，已不甚高兴玩足球，驾汽车了。他老早另有了别种成年人的嗜好和兴趣，大多数且已结过了婚，他们有了爱妻和家庭牵挂着他们的心，还有父母劳他们怀念，或许还要帮助几个堂兄弟求学。负担，使得人庄重严肃，而民族文化的传统观念亦足使他们的思想趋于稳健，早于生理上自然发展的过程。

但是中国人的圆熟非自书本中得来。而出自社会环境，这个社会见了少年人的盛气热情，会笑出鼻涕。中国人有一种轻视少年热情的根性，也轻视改革社会的新企图。他们讥笑少年的躁进，讥笑“天下无难事”之自信，所以中国青年老早就被教导在长者面前缩嘴闭口，不许放肆。中国青年很快的理会这个道理，因此他们不肯傻头傻脑硬撑革新社会的计划，反而附从讥评，指出种种可能的困难。不利于任何新的尝试。如此，他踏进了成熟的社会。于是留学生自欧美回国了，有的煊煊赫赫地制造牙膏，叫做“实业救国”；或则翻译几首美国小诗，叫做“介绍西洋文化”。又因他们须担负大家庭生活，又要帮助堂兄弟辈寻觅位置，假使他任职教育界，势不能常坐冷板凳，必须想个方法以求飞黄腾达，譬如说做个大学校长。这才不失为家庭的好分子。这样向上攀爬的过程，给了他一些生命和人性上不可磨灭的教训。假使他忽略了这种种经验，仍保持其年青热血的态度，到了三十几岁还兴奋地主张改进革新，那他倘不是彻底的呆子，便是捣乱份子。

让我先来谈谈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它们是怎样产生的？我相信这是文化与环境的结果。所以它们不必是中国人心理状态的一部分。它们存在迄于今日，因为我们生存于数千年特性的文化与社会之势力下。倘此等势力除去，其品性亦必相当地衰微或消灭，为自然之结论。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尤其是，家族制度的结果，家庭乃为中国社会之雏型。无可无不可之品性，大部分缘于个人自由缺乏法律保障，而法律复无宪法之监督与保证。老猾俏皮导源于道家之人生观——老猾俏皮这个名词，恐犹未足以尽显这种品性的玄妙的内容，但亦缺乏更适当的字眼来形容它。当然，上述三种品性皆源导于同一环境，其每一品性列举一原因者，乃为使眉目较为清楚耳。

忍耐为中国人民之一大美德，无人能猜想及有受批驳之虞。实际上它所应受批驳的方面，直可视为恶行。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苦，远过于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颇有视此等痛苦为自然法则之意，即中

国人所谓天意也。四川省一部分，赋税预征已达三十年之久，人民除了暗中咀骂，未见有任何有力之反抗。若以基督徒的忍耐与中国人作一比较，不啻唐突了中国人。中国人之忍耐，盖世无双，恰如中国的景泰蓝瓷器之独步全球。周游世界之游历家，不妨带一些中国的“忍耐”回去，恰如他们带景泰蓝瓷一般，因为真正的个性是不可摹拟的。我们的顺从暴君之苛敛横征，有如小鱼之游入大鱼之口，或许我们的忍苦量假使小一些，我们的灾苦倒会少一些，也未可知。可是此等容忍磨折的度量今被以“忍耐”的美名，而孔氏伦理学又谆谆以容忍为基本美德而教诲之，奈何奈何！我不是说忍耐不能算是中国人民之一大德性。基督说：“可祝福哉，温良谦恭，惟是乃能承受此世界。”我不敢深信此言。中国真以忍耐德性承受此半洲土地而过有之乎？中国固把忍耐看作崇高的德行，我们有句俗语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由是观之，忍耐是有目的的。

训练此种德行的最好学校，是一个大家庭，那儿有一大群媳妇舅子，妹丈姊夫，老子和儿子，朝夕服习这种德行，竭力互相容耐，在大家庭中，即掩闼密谈，亦未免有忤逆之嫌，故绝无个人回旋之余地。人人从实际的需要以及父母的教训自幼受了训练使互相容忍，俾适合于人类的相互关系。深刻而徐进的日常渐渍之影响于个性是不可忽视的。

唐代宰相张公艺以九代同居为世所艳羨。一日，唐高宗有事泰山，临幸其居，问其所以能维持和之睦理，公艺索一纸一笔，书“忍”字百余为对，天子为流涕，赐嫌帛而去。中国人非但不以此为家族制度之悲郁的注解，反世世羡慕张公之福，而“百忍”这句成语，化成通俗的格言，当书写于殊红笺以为旧历元旦之门联。只要家族制度存在，只要社会建立于这样的基础上，即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以一个分子的身份生活于和谐的社会关系中，那很容易明了忍耐，以何须视为最高德行，而不可免地培育于这个社会制度里头。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头，“忍耐”自有其存在之理由。

中国人的忍耐虽属举世无双，可是他的无可无不可，享盛名尤为久远。这种品性，我深信又是产生于社会环境。下面有一个对照的例子，故事虽非曲折，却是意味深长，堪为思维。我们且试读英国文学里汤姆·布朗（BrownTom）母亲的临终遗训：“仰昂你的头颅，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问话。”再把中国母亲的传统的遗嘱来作一对比，她们总是千叮万嘱的告诫儿子：“少管闲事，切莫干预公众的事情。”她们为什么这样叮咛，就因为生存于这个社会里，那儿个人的权利一些没有法律的保障，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淡消极态度最为稳妥而安全，这就是它的动人之处，此中微妙之旨固非西方之所易于理会。

据我想来，这种无可无不可态度不会是人民的天生德性，而是我国文化上的一种奇异产物，是我们旧世界的智慧在特殊环境下深思熟虑所磨练出来的。泰纳（Taine）说过：罪过和美德为如糖与硫酸之产物。使非采取这种绝对的见解，你不难同意于一般的说法，谓任何德行，如容易被认为有益的，则容易动人而流行于社会，亦容易被接受为生命之一部。

中国人之视无可无不可态度犹之英国人之视洋伞，因为政治上的风云，对于一个人过于冒险独进，其险恶之征兆常似可以预知的。换句话说，冷淡之在中国，具有显明的“适生价值”。中国青年具有公众精神不亚于欧美青年，而中国青年之热心欲参与公共事业之愿望亦一如其他各国之青年，但一到了 25 岁至 30 岁之间，他们都变得聪明而习于冷淡了。（我们说：“学乖

了。”中国有句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冷淡之品性，实有助于圆熟和教育。有的由于天生的智慧而学乖了，有的因干预外事惹了祸，吃了一次亏，学了一回乖。一般老年人都写写意意，玩着不管闲事的模棱两可把戏，因为老滑头都认识它在社会上的益处，那种社会，个人权利没有保障。那种社会，因管了闲事而惹一次祸就太不值得。

无可无不可所具的“适生价值”，是以存在于个人权利缺乏保障，而干预公务或称为“管闲事”者太热心，即易惹祸之事实。当邵飘萍和林白水——我们的二位最有胆识之新闻记者——1926年被北洋军阀枪毙于北平，曾未经一次审讯，其他的新闻记者自然马上学会了无可无不可之哲理而变成乖巧了。中国最成功的几位新闻记者所以便是几位自己没有主张的人。像中国一般文人绅士，又像欧美外交家，他们方自夸毫无成见。不论对于一般的人生问题或当前哄动的问题，他们都没有成见。他们还能干什么呢？当个人权利有保障，人就可变成关心公益的人。而人之所以兢兢自危者，实为诽谤罪之滥施。当此等权利无保障，我们自存的本能告诉我们，不管闲事是个人自由最好的保障。

换句话说，无可无不可本非高价值之德性而作为一种社交的态度，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感到其必要，那是一种自卫的方式，其发展之过程与作用，无以异于忘八蛋之发展其甲壳。中国出了名的无情愆之凝视，仅不过是一种自卫的凝视，得自充分之教养与自我训练。我们再举一例证，则此说尤明。盖中国之盗贼及土匪，他们不需依赖法律的保障，故遂不具此种冷淡消极之品性而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侠义，最关心社会公众的人。中国文中侠义二字几不可区别地与盗匪并行，水浒一书，可为代表。叙述草莽英雄之小说，在中国极为风行，盖一般人民乐于阅读此等英雄豪杰的身世及其行事，所以寄其不平之气焉。ElinorGlyn之所以风行，其缘由亦在乎此，盖美国实存有无数之老处女在焉。强有力之人所以多半关心公众社会，因为他力足以任此，而构成社会最弱一环之大众懦弱流，多半消极而冷淡，盖彼等须先谋保护自身也。

观之历史，则魏晋之史绩尤足为此说之证明，彼时智识阶级对国事漠不关心，意气至为消沉，乃不旋踵而国势衰微，北部中国逐渐沦陷于胡族。盖魏晋之世，文人学士间流行一种风气，纵酒狂醉，促膝清谈，又复迷信道家神仙之说，而追求不死之药。这个时代，自周汉以后，可谓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最低劣的时代，代表民族腐化过程中之末端，渐进而演成历史上第一次受异族统治之惨祸。此种清静淡漠之崇拜，是否出于当时人之天性，假若不是，则何由而产生演变以成。历史所以予吾人之解答，极为清楚而确凿。

直至汉代季世以前，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不冷淡而消极，反之，政治批评在后汉盛极一时，儒生领袖与所谓大学生达三千人，常争议当时政弊，讥扬幽昧，胆敢攻击皇族宦官，甚至涉及天子本身，无所忌讳。只因为缺乏宪法之保障，此种运动卒被宦官整个禁压而结束。当时学士二三百人连同家族，整批的被处死刑或监禁，无一幸免。这桩案件发生于166至169年，为历史上有名之党锢，且刑狱株连甚广，规模宏大，办理彻底，致使全部运动为之夭折，其所遗留之恶劣影响，直隔了百年之后，始为发觉。盖即发生一种反动的风尚而有冷淡清静之崇拜。与之相辅而起者，为酒狂、为追逐女人、为诗、为道家神学。有几位学者遁入山林，自筑泥屋。不设门户，饮食辟一窗口而授入，如此以迄于死，或则假作樵夫，有事则长啸以招其亲友。

于是继之又有竹林七贤之产生，此所谓竹林七贤，均属浪漫诗人。如刘伶者，能饮酒累月而不醉，尝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插而随之，曰：死便埋我。当时人民不以为忤，且称之为智达。那时所有文人，流风所被，或则极端粗野，或则极端超俗。似另一大诗人阮咸，尝与婢女私通，一日方诣友人处宴饮，宾客满座，其妻即于此时伺隙遣此婢女去，咸闻之，索骑追踪，载与俱归，不避宾客，可谓放诞。而当时受社会欢迎的即是这般人。人民之欢迎他们，犹如小乌龟欢迎大乌龟之厚甲壳。

这里我们好像已经指明了政治弊病之祸，因而明了无可无不可之消极态度之由来，此冷淡之消极态度亦即受尽现代列强冷嘲热讽之“中国人一盘散沙”之由来。这样看来，医治此种弊病的对症良药，很为简单，只要给人民的公民权利以法律之保障。可是从未有人能见及此。没有人希望它，也没有人诚意热切地需要它。

不妨随便谈谈，中国人最富刺激性的品性是什么？一时找不出适当的名词，不如称之为“老猾俏皮”。这是向西方人难以言传而最奥妙无穷的一种特性，因为它直接导源于根本不同于西方的人生哲学。倘把俏皮的人生观来与西方人的文明机构来作一比较，则西方的文明就显见十分粗率而未臻成熟。举一个比方，假设一个九月的清晨，秋风倒有一些劲峭的样儿，有一位年青小伙子，兴冲冲的跑到他的祖父那儿，一把拖着他，硬要他一同去洗海水浴，那老人家不高兴，拒绝了他的请求，那时那少年的一气非同小可，忍不住露出诧怪的怒容，至于那老年人则仅仅愉悦地微笑一下，这一笑便是俏皮的笑。不过谁也不能说二者之间谁是对的。这一切少年性情的匆促与不安定，将招致怎样的结果呢？而一切兴奋、自信、掠夺、战争、激烈的国家主义，又将招致怎样的结果呢？一切又都是为什么呢？对这些问题一一加以解答，也是枉费心机，强制一方面接受其他一方面的意见，也是同样徒然，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年龄上的问题。

俏皮者是一个人经历了许多人生的况味，变为实利的、冷淡的、腐败的行为。就其长处而言，俏皮人给你圆滑而和悦的脾气，这就是使许多老头儿能诱惑小姑娘的爱苗而嫁给他们的秘密。假使人生值得甚么，那就是拿和气慈祥教了人们以一大教训。中国人之思想已体会了此中三味，并非由于发觉了宗教上的善义，而得自深奥文广博的观察与人生无限之变迁。这个狡猾的哲学观念可由下面唐代二位诗僧的对话见其典型：

一日，寒山谓拾得：“今有人侮我，辱我，慢我，冷笑笑我，藐视目我，毁我伤我，嫌恶恨我，诈谲欺我，则奈何？”拾得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让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装聋作哑，漠然置他。冷眼观之，看他如何结局。”

此种老子的精神，以种种形式，时时流露于我国的文、词、诗、俗语中，欲举例子，俯拾即是：如“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好汉不吃眼前亏”、“退一步想”、“负一子而胜全局”，都是出于同一根源的态度。此等应会人生之态度，渗透了中国思想的整个机构，人生于是充满了“三思而行”，充满了“三十六着”，顽梗的素质渐次消磨，遂达到了真实的圆熟境地，这是中国文化的特征。

就其弊病而言，俏皮——它是中国最高的智慧——阻遏了思想和行动的活跃性，它捣碎了一切革新的愿望，他讥诮人类的一切努力，认为是枉费心机，使中国人失却思维与行动之能力。它用一种神妙的方法减弱一切人类的

活动至仅敷充饥及其他维持生命所必需之程度。孟子是一大俏皮家，因为他宣称人类最大愿望为饮食和男女，所谓食色性也。已故大总统黎元洪也是一位大俏皮家，因为他能深切体会中国政治格言而提出了和解党争的原则。却说是“有饭大家吃”。黎总统是一位尖刻的实体论者而不自知。可是他所说的，比较他所知道的来得聪明，因为他直接说出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经济背景。拿经济的眼光来解释历史，在中国由来已久，亦犹如左拉（Emielzola）之流的拿生物学来解释人生。在左拉，这是智识的嗜好，而在中国是民族的自觉。实体论者之于中国，非学而能，乃生而能者。黎元洪从未以脑动作研究专家著称，但是他因为中国人，知道一切政治问题无非是饭碗问题；因为是个中国人，他给中国政治下了一个精深的解释。

此冷淡而又实利的态度，基于极为巧妙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只有耄艾的老人和耄艾的民族始能体会其中三昧，不满三十岁的年青人还不够了解它，所以欧美的年青的民族也还不够了解它。故“道德经”著者老子之所以名为老子，似非偶然。有些人说，任何人一过了四十岁，便成坏骗子，无论怎样，我们年纪越大，越不要脸，那是无可否认的。二十左右的小姑娘，不大会为了金钱目的而嫁人，四十岁的女人，不大会不为金钱目的而嫁人——她们或许称之为稳当。希腊神话中讲过这么一件故事，不能谓为想入非非：故事讲年轻的伊加拉斯因为飞得太高，直让蜡质的羽翼都融化了，致扑落跌入海洋了。至于那老头儿谭达拉斯则低低的飞着，安安稳稳飞到了家中了。当一个人年纪长大了，他发展了低飞的天才，而他的理想又揉和之以冷静的慎重的常识，加之以大洋钿之渴念。实利主义因为老头儿之特性，而理想主义则为青年人之特性。过了四十岁，他还不能成为坏坯子，那倘不是心脏萎弱者，便该是天生才子。才子阶级中便多有“大孩子”，像托尔斯泰，史蒂文生、巴莱。这些人具有天生的孩子脾气，孩子脾气再加以人生经验，使他们维持永久的年青，我们称之为“不朽”

这一切的一切，彻底说一说，还是纯粹的道家哲学，无论在理论是或实际方面；因为世界上收集一切人生的俏皮哲学者，没有第二部像那短短的道德经那样精深的著作。道家哲学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即为一种俏皮圆滑的冷淡，是一种深奥而腐败的怀疑主义，它是在讥讽人类冲突争夺的枉费心机、以及一切制度、法律、政府、婚姻之失败的嘲笑，加以少许对于理想主义之不信心，此不信心之由来，与其谓由于缺乏毅力，毋宁说由于缺乏信心。它是一种与孔子实验主义相对立的哲学，同时亦为所以补救孔教社会之缺点的工具。因为孔子之对待人生的眼光是积极的，而道学家的眼光则是消极的，由于这两种根本不同的元素的锻冶，产生一种永生不火的所谓中国民族德性。

因是当顺利发展的时候，中国人人都是孔子主义者，失败的时候，人人都是道教主义者。孔子主义者在我们之间努力建设而勤劳；道教主义者则袖手旁观而微笑。职是之故，当中国文人在位则讲究德行；闲居则遣情吟咏，所作固多为道家思想之诗赋。这告诉你为什么许多中国文人多写诗，又为什么大半文人专集所收材料最多的是诗。

因为道家思想有如咖啡，含有神秘的麻痹作用，所以能令人感觉异样的舒快。它治疗了中国人的头痛和心痛毛病。它的浪漫思想、诗意、崇拜天然，在乱世之秋，宽解了不少中国人和性灵，恰如孔子学说之著功盛平之世。这样，当肉体受痛苦的时候，道教替中国人的灵魂准备了一条安全的退路和一

服止痛剂。单单道家思想的诗，已能使孔教典型的严肃的人生稍为可忍受一些了；而它的浪漫思想又救济了中国文学之陷于歌颂圣德，道学说教之无意义的堆砌。一切优美的中国文学，稍有价值为可读的，能舒快地愉悦人类的心灵的，都深染着这种道家精神。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国思想的阴阳两极，中国的民族生命所赖以活动。

中国人民出于天性的接近老庄思想甚于因教育而接近孔子思想。我们忝属人民一分子，人民之伟大，具有天赋人权，故我们基于本质的公正概念，足以起草法典，亦足以不信任律师与法庭。百分之九十五的法律纠纷固在法庭以外解决。人民之伟大，又足以制定精细之典礼，但也足以看待它作为人生一大玩笑，中国丧葬中的盛宴和余兴就近乎此类。人民之伟大，又足以斥责恶行，但亦足以见怪不怪。人民又伟大足以发动不断之革命，但亦足以妥协而恢复旧有之政体。人民又足以细订弹劾官吏的完备制度、交通规则、公民服役条例、图书馆阅览章程，但又足以破坏一切章程制度条例，可以视若无睹，可以欺瞒顽忽，并可以摆出超越的架子。我们并非在大学校中教授青年以政治科学，示之以理想的行政管理，却以日常的实例以见县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实际上怎样干法。不切实的理想于我们无所用之，因为我们不耐烦空想的神学。我们不教导青年使成为上帝子孙。但使他们以言行模拟圣贤而为正常现世的人物。这是我为什么确信中国人本质上是“人文主义者”，而基督教必定失败于中国，非然者，它必先大大的变更其内容。基督教教训中所能被中国人所诚心接受之一部分，将为基督训诫之如下述者：要“慈和如鸽”，“机敏如蛇”。此两种德行，如鸽之仁慈与如蛇之智慧，是俏皮的二大属性。

简言之，我们固承认人类努力之必需，但亦需容认它的虚在。这一个普通心理上的状态，势必有一种倾向，发展被动的自卫的智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在这一个基本原则下，一切中国人之争论都草草了事，一切计划纲领须大事修改，一切革命方案要大打折扣，直至和平而大家有饭吃。我们有句俗语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它的意义等于“勿生事”，“莫惹睡狗”。

人的生活像是蠕动于奋斗力极弱，抵抗力极微的生活线上，并由此而生出一种静态的心理，这使人堪以容忍侮辱而与宇宙相调和。它也能够发展一种抵抗的机谋，它的性质或许比较侵略更为可怕。譬如一个人走进饭店，饥肠辘辘，可是饭菜久待不至，不免饿火中烧，此时势必屡屡向堂倌催促，倘使堂倌粗鲁无礼，可以诉之于账房谋出气；但倘令堂倌回答得十分客气，连喊“来了来了”以应。而身体并不动弹一步，则一无办法，只有默祷上帝，或骂他一二声，还须出以较为文雅之口吻。像这样的情形，总之，就是中国人的消极力量，这种力量谁领教得最多，谁就最佩服它，这是老猾俏皮的力量。